

“道家(道教)文化与当代文化 建设”学术讨论会开幕词

萧 蓬 父

道家思想文化(包括道教思想文化)在我们传统思想文化的发展中,据有重要的地位,发挥过独特的作用,对于我们今天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有不容忽视的意义。长期以来,在国内外都流行一种模糊观念,似乎儒家文化即可以代替或代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一谈到传统文化,无论褒之者,或贬之者,都注目于儒家,把传统文化单一化、凝固化、儒家化。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流行这一观念,自有其形成偏见的历史根源。尽管传统偏见仍在起作用,“儒热道冷”的局面当未根求改变,但80年代以来,随着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道家及道教的研究也有了许多方面的新进展,研究领域扩大了(由老、庄扩展到稷下道家、黄老道家、以及新出土的《帛书四篇》、《文子》、《鹖冠子》等等,由先秦道家延伸到后世的道家及道教学者,从严君平到傅山,都有论述),研究内容加深了(摆脱了“两军对战”的模式,着力于道家的范畴体系、思维方式的特点,以及道家的大小宇宙观、正负价值观、生死观、自由观、真理观、道德观、审美观等的研究,都有所开拓),研究方法更新了(许多作者不再采取孤立、静止的研究方法,而力图纵向地作动态研究,把握道家思想的史的衍变和发展,或横向地作各种比较研究,网络式地把研究扩展到道家与传统文化各层面的关系,并力图在阶级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分析方法、逻辑分析方法、心理分析方法,在概念绎解上吸纳现代诠释学方法,在文献疏证上试用穷举对比和统计分析方法,都取得一定成果),因而吸引了更多的人对道家(以及道教)思想文化刮目相看,并普遍增长了研究的热情和兴趣。我们这次隆中盛会,也就是在这种新形势下召开的。我们希望,通过这次会,能把道家研究的兴旺势头,再往前推进一步。

但是,就道家所处的客观历史地位及其曾发挥的文化功能而言,就道家思想文献的丰富但长期被荒芜、道家文化传统可能具有的现代意义但急待发掘而言,再就道家及道教研究的某些方面与日本、西欧某些机构的研究进展相比较而言,则我国目前的研究现状,无论是计划、规模、力量的投入、研究的成果等,都是远不相称的。再就国内对传统文化中儒、道、释三大主流思潮的研究而言,发展也极不平衡。近几年,在海内外现代新儒家的鼓荡下,儒学研究已形成热潮;佛教研究早有基础,近来更有大的发展,单是禅学的专门刊物就新出了两种;对比之下,道家及道教文化的研究就显得相形见绌了。为了全面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多维格局,为了全面推进传统文化的研究并使之走向世界、走向未来,当前道家思想文化的研究,似应特别着力,急起直追,应当从根本上破除尊儒贬道、即把儒家奉为正统而把道家斥为异端的传统文化偏见,应当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对于儒、道各家思想的理论价值和现代意义,更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圭臬、以现代文化意识为参照,重新加以评定;而不能依传统中的正统观念(正统的“治统”观念与正统的“道统”观念)去人云亦云。这就需要坚持科学态度,培养理论勇气,付出巨大努力。

例如,对于结束了先秦百家争鸣的两汉学术思想的朝野各家,怎样分疏,怎样评判,怎样确立评判者的价值尺度和历史爱憎,就有一个对传统观念的别择取舍问题。有人依传统中的正统观念,大肆表彰董仲舒“为儒者宗”的“天人三策”及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路线的巨大的积极的“贡献”,而同时贬低其他以“杂”为特点的异端思想,对道家更斥之为“消极”或“逆转”。但也可以另立一个评判的尺度,如把秦皇、汉武的文化专制视为以思想罪兴两次大狱,一诛吕不韦集团,一诛刘安集团,都株连镇压了大批优秀学者,而特别使道家遭受到残酷打击。汉代自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独尊儒术的献策之后,大批儒林博士,奔兢利禄,

“高论白虎，深言日食”，使儒学也彻底笺注化、教条化、庸俗化。如顾炎武所斥“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当时，正是道家，虽遭残酷打击，而并未掩旗息鼓，如司马迁，被斥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退六经”，身受腐刑，打入蚕室，仍然奋力写成《史记》这一辉煌巨著；此外，还有卖卜为生的严君平，投阁几死的扬雄，直言遭贬的桓谭，废退穷居的王充等卓立不羁的道家学者，都在学术上取得许多重要成果，作出了超迈儒林的独特贡献。这样来评判两汉学术，则会发现道家在当时表现了茁壮的学术生命力，司马迁的《史记·自序》和王充的《论衡·自纪》等，更充分体现了我们民族传统精神文化中最可贵的时代忧患意识和社会批判意识。这是道家思想的重要特点，是道家学者对我们民族精神文化的内蕴所作出的历史贡献。至于历代道家以其固执天道自然、抗议伦理异化的理论趣向，在科学、文艺、哲学思辨等方面所贡献的许多有价值的成果，毫无疑问是值得马克思主义者加以认真研究和科学总结的。

又如，道家的学风及其文化心态，与儒家两家的拘谨、独断和狭隘相比较而言，显然具有更多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前瞻性。如对于“万物并作”、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基本态度，老子提出“知常容，容乃公”的原则，主张“和光、同尘、挫锐、解纷”；宋钘、尹文提出“别囿”，“不苟于人，不忤于众”，“以驺合驺，以调海内”，都表现出一种宽容、和解的气度。庄子继之，提出齐“物论”、去“成心”，更从理论上论证“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而主张“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易传》《中庸》正是窃取了这些而形成“道并行而不相悖，物并育而不相害”等优秀思想。《秋水》篇等深刻揭示了真理的相对性、层次性和人们对真理的认识不同层次都有其局限性，生动的“井蛙、河伯、海若”对话的寓言，通过认识的三个层次，把人们引向日趋广阔的视野，引向一种不断追求、不断拓展、不断超越自我局限的崇高精神境界。孔子自称：“朝闻道，夕死可矣”；庄子却说：“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庄子》上记载颜回对孔子毕恭且敬，称“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夫子驰亦驰，夫子奔逸绝尘，而回蹉乎后矣！”学生永远赶不上老师。而庄子却说：“送君者自其涯而返，君自此远矣！”显然是两种真理观，两种学风，两种胸怀。司马谈总结先秦学术时，正是从学风的角度赞扬道家能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以虚无为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王充所坚持的“虽违儒家之说，但合黄老之义”的学术路线和学风，也主张像“海纳百川”一样“胸怀百家之言”，才能成为博古通今的“超奇”的“通人”。足见，道家的学风及其对于异己学术的文化心态是较为宽容、开放而具有广阔的胸怀的。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很值得注意的优秀思想遗产。我们注意并欣赏这种历史上的优秀思想传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科学学风，正要求我们以开放心态来对待古今学术成果，对待真理发展的客观辩证法。马克思在写《剩余价值学说史》时曾立下一个原则：“我设立了一个历史法庭，对每个人论功行赏。”列宁强调马克思主义绝没有任何狭隘的宗派性、保守性，而是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上吞吐百家而不断发展。毛泽东制定“双百”方针及其理论基础，也提醒我们要有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的远大胸怀。所以，我们认为道家的学风，是有可取之处的；道家文化心态及其留下的思想遗产，值得我们去发掘、研究，并给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总结。

至于道家文化的现代意义、道家文化与现代文化建设的关系问题，我们这次会并非偶然地选择了这个主题。因为，这方面确有广阔的理论内容和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探讨。道家立论的根本点是贵己养生，全性保真，更强调养生之主、德充之符，强调“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的“真人”的“真知”，就在于了解自然与人之间统一、协调的关系。道家从自然哲学深入到生命哲学，再转到人体功能的深入研究，从宇宙大生命和个体小生命、大宇宙与小宇宙的互动与同构的角度，揭示出许多生命的奥秘、人体功能的自然节律。近些年，海内外不少学者对道家及道教的这一方面的贡献，作了不少实证性或唯象学的研究，并给以现代医学、现代生命科学的诠释，发掘出道家养生学的现代科学的意义。从这里，可能生长出中国式的人体生命科学（继承道家文化传统而又又是现代化的气功学、内丹学等）。当然，养生学只是道家思想的一个小侧面；道家思想的其他方面，社会政治观、道德伦理观、文化价值观以及思维方式、人格境界、审美情趣等等，都富有可以发掘并重新评定的现代意义。

这次以道家文化为主题的学术会，自当提倡道家传统的臻上论辩的学风，更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加以发展，也就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以改革开放的心态，实践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样我们的会就不会开成“独弦哀歌”的会，而定会开成一个“众妙之门”的会：

1990年7月10日于湖北襄阳隆中

（本文责任编辑 涂赞琥）